

我忆巴金·田一文著

Woyibajin·TianyiwenzhuWoyibajin·TianyiwenzhuWoyibajin·TianyiwenzhuWoyibajin·Tianyiwenzhu

1989

● WOYIBAJIN



我和巴金是四十多年的朋友。我们的感情
亲密。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，早年是那个
的理想把我们系在一起。我们都愿为人类
福，为理想献身……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● 我忆巴金

给巴金塑像（代序）

放眼望去，巴金满头银丝，策杖而行，步履蹒跚，前额宽大；你再凝眸静望，他是那么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。从他身上，你可以深刻理解寓伟大于平凡的意义。他常常说：“我是平凡到极点的人。”然而就是这个人，作品浩如烟海，他巍巍屹立其中。

巴金的心在流血，一颗跳动着的艺术良心在流血；巴金的心在喷火，是烧毁人间恶与丑的怒火，爱与憎的火焰，一团熊熊的烈火，永不熄灭。

就这样，巴金掏出了自己的心，自己的爱，自己的强烈憎恨。

巴金在痛苦地呼号。我仿佛听到了他的发自心灵的声音：“我控诉！”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，控诉法西斯的暴行，……用不可遏止的愤怒，

倾注着全部感情，发出了血和泪的控诉。

一生追求光明。1949年的一天，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。

旧社会的灭亡，封建制度的崩溃，“四人帮”的粉碎，都是光明战胜了黑暗。黑暗，是可以征服的。

未来是美好的。巴金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。

巴金爱真理，爱正义，爱祖国，爱人民，爱全人类，爱人间的美好事物。巴金说：“我……有多么深的爱。”又说：“我的爱永不熄灭。”

倾注着永不熄灭的爱，总是那么热情奔放，那么燃烧着火焰，直到八十二岁高龄，还在追求着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：真实地反映生活，反映社会，反映历史，真实地反思。

在“五四”时代，从封建大家庭中走出来，开始生活的长征。巴金面向人生，面向社会，不管征程多么遥远，旅途多么艰难，任何困境都吓不倒这个年轻人。他记得自己说过的话：“奋斗就是生活，人生只有前进。”他奋斗着，前进着，果敢而又坚实。

憧憬着“一个万人安乐的社会”，而在1949年，美丽的憧憬终于变成了美丽的现实。

巴金投入了火热的斗争。他到过祖国很多地

方。他奔走着，呼号着，他发出的是新的声音，贴近生活的声音。他到过不少国家，他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努力。

朴实、热情而且谦逊，他是许多年轻人的益友；他是文学的前辈，是我们敬爱的先生，平凡而又伟大的圣者；是真正的人，是经过严峻考验的战士。他发出的光明的呼声，有众多的、热烈的响应。

帮助人、使人幸福，是巴金一生的信念。他把多量的友情给予相识者和不识者，只给予，不“取得”。在1958年，他曾有过不顾个人安危、慷慨解囊、援助一个年轻友人的故事。

多么高贵的友情！巴金把友情看得很重要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：“我是靠友情活着。”他往往忘记了自己给予别人的，只记得他的“取得”。这是一种特殊的无私感情：忘却自己的给予，却牢记着自己的取得，哪怕是一点友爱，一点温暖。

巴金自称他有三个先生。“第一个是我的母亲，第二个是轿夫老周，第三个是朋友吴。”巴金说：“母亲教给我爱，轿夫老周教给我老实（公道）；朋友吴教给我‘自我牺牲’。”

母亲完满地体现了一个“爱”字。巴金说：“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，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。……她教我爱一切的人。不管他们贫或富，

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；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，怜恤他们，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，动辄将他们打骂。”而轿夫老周和友人吴，则教给他认识社会和应抱的生活态度。

在六十年的文学生涯中，在时代的激流里，在抗战的烽火下，他激发着青年，鼓动着青年，点燃青年们的火焰；影响不少青年走向革命，走向革命圣地延安。

巴金有一颗纯洁、透明的心。心中有一团火。火在炽烈地燃烧着。这火，烧毁着一切阻碍人类进步的黑暗、丑恶的事物。照彻着所有阴暗的角落。照亮了暗夜中的眼睛。这些眼睛，看到了光明的未来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

巴金奉献着，他向读者奉献了几百万字，辛劳地刻下了文学的丰碑。

十年浩劫，巴金被囚于炼狱^①。他忍受着不是一个人可以忍受得了的屈辱、折磨和痛苦；忍受着，却仍在心头燃烧着扑灭不了的火焰。这是圣火。这是生命的火焰。活着，要顽强地活下去。活着就是胜利。

“巴金身经百斗”，终于活出来了，终于通过了炼狱。

利剑强刻在灵魂上的罪恶，应还给那些手握利

^① 借用王西彦《炼狱中的圣火》一文立意。

剑的人，让他们受到末日的审判。

巴金返真归璞了。他变得更善良、更纯洁了。他闪着璞的美、璞的光。

巴金追求真实，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；他向读者奉献了一部真实的书——五集《随想录》。从这里听得出：一颗真实的艺术良心如何热烈地在跳动。

瞧，巴金来了，他蹒跚地向我们走过来了。他来到我们中间，跟我们心贴着心，跟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我们，——巴金的千千万万的读者。

巴金来了，亮着宽大的前额来了，他一头银丝，策杖而行，步履蹒跚；他蹒跚地向我们走过来了，他在温和地微笑着，笑着，而且喃喃着。他将喃喃地说些什么呢？这位说自己是平凡到极点而又寓伟大于平凡的人！

是的，他是多少人敬爱的先生，多少人的益友，多少人的前辈；是的，他是中国文坛的一颗巨星，它在闪耀着，在散发着光，散发着热，散发着温暖与光明。他是纯洁的星，善良的星，美丽的星，灿烂的星，他向我们眨着燃烧的眼睛。

巴金来了，蹒跚地来了，我们用鲜花向他身上抛撒着，我们爱戴他。我们，——千千万万巴金的读者。

8441

— 1 —

目 录

给巴金塑像（代序）	1
初识巴金	1
忆巴金写《火》第二部	7
忆巴金写《憩园》	15
忆巴金写《寒夜》	22
《家》的回顾	30
巴金与编辑工作	35
友 情	48
海一样的胸怀	55
刻骨的思念	58
往事随想	68
璇宫门外	78

巴金与缪崇群	82
三月的会晤	89
第二次探望巴金	97
关于巴金写给我的信	104
附录一：忆萧珊	107
附录二：忆平凡的友人	111
后 记	127

初识巴金

——忆难忘的1938年

1938年9月，我从大别山回到武汉，在汉口呆了几天。这几天，我去看望了一些朋友，他们都是过去跟我一起做救亡工作的同志，我希望跟他们见面。我一连跑了几家，只找到了年长的老龙。别的朋友都已撤离了武汉。

老龙告诉我，一个多月以前，巴金到过汉口，在汉口扬子江饭店住了一些日子，武汉的年轻朋友都去看望过他。他跟大家谈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，他那时的信仰是人所共知的。有着同样信仰的年轻人，都希望从他那里知道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立场和态度。老龙说，关于这个问题，老巴谈得很明朗，很肯定。他说，我们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

线，我们都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。国家兴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，我们应该做爱国主义者，也要抗日，也要保卫祖国。巴金的热情谈话鼓舞着一些年轻朋友抗日救亡，勇敢前进。友人文叔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他在中学时代收到巴金的一封回信中的两句话：“奋斗就是生活，人生只有前进。”

当时，我没有见到巴金。

10月，我随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到桂林。巴金也在这时来到了这个山水秀丽的城市。

我已记不清楚，我是怎么得悉他的住址，是在哪一天高兴地跑去看他的。也记不清楚是怎样向他作了自我介绍。我只记得，他那时住在东郊福隆街林憾庐先生那里。从我的住处到他那里去，隔着一道澄清见底的漓江，要过一道闪闪浮桥，再走没多远，就是他的临时住所。

事隔四十余年，我还能回忆起当年跑去看望巴金的时候激荡过我的那种感情。

同许多巴金的读者一样，我也狂热地爱读他的作品，他写的一些小说中的人物鼓舞着我在黑暗中寻找光明。我需要一种鼓舞我前进的力量，而在巴金的作品里，正有这种我需要的力量。在没有和巴金见面以前，我已经读过他的《灭亡》、《新生》、《死去的太阳》、《爱情的三部曲》这样一些作品。这些作品都深深地感动过我，告诉我去反抗那个不

合理的社会制度，使我懂得了爱与憎。

我去看望巴金以前，曾经想过他的模样。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巴金小说《雨》一书的封面有着巴金的画像，这画像帮助了我去想象。我想，他一定是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，穿着讲究的西服，有着很大的脑袋和很宽的前额；他大概很会说话，他谈起来大概象他写的小说一样热情、流畅；他大概很爱抽烟；大概……总之，我想得很多。

我心情激动，也有些紧张。当我找到东郊林憾庐先生那里的一间宽大房间时，一颗心就抑制不住地跳快了，感到手脚不好安顿，神态颇不自然。我走近他，小声地说：“李先生，我是一文。”他接着亲切地说：“一文，请坐，请坐。”他热情地和我握手，招呼我在一把木椅上坐下。并说：“听武汉的朋友谈起过你。你写的东西我也看过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把我介绍给他的女友萧珊。他跟我谈话很随便，跟我一见如故，待我就象待一个很熟的朋友一样。我觉得自己有些好笑，我笑自己有些把巴金神秘化，笑自己那种激动的感情。我想，我那天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很可笑的。

那天，巴金穿着一身咖啡色旧西服，鼻梁上架一副黄边近视眼镜。他谈话比较快，微微有点口吃。他不摆架子，也不会抽烟，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作家，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，一个感情丰富的

人。我们面对面坐着。我们谈着一些普普通通的事情。面对着这样一位似乎并不感觉自己声望赫赫的人，我没有把内心深处的崇敬感情说出来。我记得我只谈一点过去的痛苦生活：谈了我如何在十二岁那年失去父亲、十四岁失学，以及家里如何经常揭不开锅，自己如何拾垃圾、烟蒂，念完小学又如何上不起中学这样一些往事。我生怕谈了这些事情他会瞧不起我。然而，他却安慰我，鼓励我。我又想起了他写给文叔的回信中的那两句话：“奋斗就是生活，人生只有前进。”

我从巴金那里兴奋地告辞出来，他热情地和我握手，他叫我没事时常到他那里去坐。他说：“我们是朋友。”我理解“朋友”这个词的深刻含义。

呆在桂林的那些日子，我到巴金那里去过多次。每次见面，都谈了些值得记下来的话，可惜大抵记不清楚了。但有的事情印象比较深，还是记得的。现在，我还记得他上广西大学演讲的事。

巴金不善辞令。可是，广西大学偏偏两次三番地邀请他去演讲。因为情面实在难却，他终于答应下来。事后，萧珊说：“演讲那天，我跟李先生一起同去广西大学。他一走上讲台，就窘得不得了。他想好了要讲的话，没讲多少，就讲不下去了。他窘得面红耳赤，不知自己讲了些什么。后来实在讲不下去了，只好退下讲台。下了讲台，脸和耳朵还

是红的。当时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李先生也觉得好笑，也笑了。”萧珊一面说，一面笑，笑得很天真。我被萧珊逗笑了。巴金也止不住笑。他知道自己不擅长演讲，但是他没有让广西大学的学生失望。对于那些满怀希望的青年，他不在乎短处被他们看到，他向他们尴尬地暴露自己。他是这样地爱护年轻人。

巴金不喜欢空谈理想。他曾对我说过理想与现实的问题。他说，我们谈理想，是要努力把理想变成现实；我们要为理想脚踏实地地做些事情。他在桂林编了《文丛》五、六期合刊，一个人编辑、校对、跑印刷所，实实在在地为抗日救亡工作，为抗战文学工作。这时，他的女友萧珊，也帮着做了一点她力所能及的事。

我还记得，我离开桂林去香港以前，杨朔曾约我到重庆去参加王礼锡领导的“笔部队”。当时我有点心动，但又想跟着二队到南洋去看看。我拿不定主意，去找巴金商量。他劝我不要三心二意，劝我跟二队走。他说，参加“笔部队”去西北，和随二队去南洋，都是为抗战工作，演剧救亡也很有意义，也可以体验生活，不妨到菲律宾、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去看看。等你回国后，我们再到重庆去，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办起来。我们约定在重庆建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计划，1941年实现了。这是我们见面

以后的一个重要收获。

二队启程去香港的时间确定了。临行前两天，我到东郊去向巴金告别。我们又谈到了在重庆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事，谈了一些初步设想。握别的时候，他送给我一件西装上衣。“把这件上衣穿上吧。你穿得太单薄了。”他友爱地说。我颤动着双手把上衣接过来，感动地点点头，却没有说出想说的感激的话。接着，他又说：“上衣旧一点，但还可以保暖。”他送给我的正是温暖的友情。最后，他告诉我他打算回上海去料理一些事情，并拟动笔写《秋》。

1938年是难忘的，因为这一年我在桂林初次见到了著名作家巴金。

1980年9月，写于汉口

忆巴金写《火》第二部

巴金的长篇小说《火》，共三部。第一部写于1938年，在靳以主编的《文丛》连载过三期，第二年9月在昆明完成。第二部写于1941年3月到5月，在重庆完成。第三部写于1943年5月，同年9月在桂林完成。巴金说：“《火》是为了唤起读者的抗战热情而写的，《火》是为了倾吐我的爱憎而写的。”又说：“在驶向南方的海轮上我还暗暗地吟诵诗人海涅的《夜思》中的诗句：‘祖国永远不会灭亡。’”海涅的这个名句，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。历史证明了这个思想的灿烂。巴金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，是所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代表。他说：“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，……我那一颗爱祖国、爱人民

的心还是象年轻时候那样地强烈，今天仍然是如此。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从这颗心涌出来的血。”这颗心涌出来的是血，也是熊熊燃烧的火；这喷涌的血与火，照耀着读者的眼睛，使他们明确正义与不义，把抗日救国的热情火一样地燃烧起来，热血沸腾地响应：“为祖国而战！”“一切为了祖国！”

巴金写《火》第二部的时候，正是1941年初夏，他已在上海霞飞坊那间三层楼房里写完了长篇小说《秋》，由上海辗转来到了重庆沙坪坝互生书店。书店是友人吴朗西开的，我那时在书店里工作。巴金和我都住在书店楼上的一间宽敞的房间里。在这里，巴金开始了《火》第二部的写作。

《火》第二部写女主人公冯文淑在战地工作团的活动。巴金写的冯文淑，就是他的夫人萧珊。“萧珊是一个普通人，冯文淑也是。”巴金说。萧珊是冯文淑的模特儿。因此，他描写冯文淑这个人物的思想感情十分真切动人。虽然，“《火》并没有写到抗战的胜利”，但是，抗战毕竟胜利了，“对这胜利贡献最大的是人民，也就是无数的普通人”。“普通人身上有许多发光的东西。”巴金又说。

巴金写《火》第二部时，正值初夏，重庆沙坪坝已热得可怕。更可怕的是臭虫和耗子，它们肆无忌惮，一到夜晚，它们就会猖獗活动，任意骚扰。耗

子在房里乱窜、乱啃，臭虫使人睡不安稳。而且，暑气逼人，入夜也不解凉。要跟白天比较，夜晚更加闷热。没有一丝风，没有一架电扇，巴金就在这火一般的房间里写《火》第二部。在这相当恶劣的环境里，巴金却从容地在临窗的方桌上写作，他那颗心涌出来的是血与火，他有着火一般的创作激情。作家的激情可以征服任何困难。酷热又算什么！

在火一般的楼房里写《火》第二部，在如此火热的环境里写出的作品，自然要唤起读者的抗战热情。巴金自己认为“《火》是失败之作”，他是过谦了。他在作品中倾吐的爱与憎，是那时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爱与憎，他写出了人民的反侵略的抗日心声。

互生书店的那间宽敞楼房，只有一张白木方桌，几个白木方凳，几张木架板床，巴金写作和休息，就在这么一个简陋天地里。

巴金没有一般作家的习惯，不抽烟，也不喝茶。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杯开水，一叠稿纸。在抗战年代，他写作都是这样随遇而安。后来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那间大办公室里写《憩园》，条件稍好一些，也好不了多少。他在抗战时期写了许多作品，都是走到哪里、写到哪里，不要求舒适的创作环境。他是那样情绪饱满。深印在我脑海中的巴金，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普通人，从不让人感觉他是一个作家。自《灭亡》问世那天起，他一直用